

基督宗教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和谐

——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为例

侯 杰 王文斌

[摘要]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活跃的非政府组织。青年会为实践其社会福音的宗旨,针对近代中国民众素质低下、社会矛盾丛生等问题,重点开展了改造青年的“德、智、体、群”的四育活动和改造社会、救灾等社会服务活动。同时,作为一个有基督教背景的社会团体,青年会为了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采取了走上层路线、影响精英人物的发展策略。青年会通过长期不懈地努力,不仅在化解近代中国社会矛盾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做出了贡献。

[关键词]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近代中国;社会和谐

[中国分类号] K25,B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873(2007)04—0040—07

[作者简介] 侯杰,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300071;王文斌,研究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300071

在近代中国,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十分活跃的非政府组织。青年会是基督教的外围团体,旨在辅助教会传播上帝的福音,引导中国人皈依上帝。青年会在宣传基督思想的同时,亦根据中国的国情做出相应的调整,以求融入中国社会。“青年会在基督教事业中虽兴起较晚,独能向本色化之途迈步前进。”值得注意的是,它不仅仅仅局限于宗教事业,而是针对各种社会问题,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从民众素质、社会风气等各方面,积极从事荣神益人的工作。为改造近代中国社会,青年会提出了一系列思想主张,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督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为中国社会的和谐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努力。

以往大陆史学界关于青年会的研究专著或者集中于对各城市青年会进行个案研究,如左芙蓉著《社会福音·社会服务与社会改造》和天津青年会组织出版的《天津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与近代天津文明》;或是从全国范围探讨基督教青年会与中国青年运动的关系,如陈秀萍著《浮沉录——中国青年运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本文则在以往所进行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从青年会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探求青年会与近代社会和谐的关系。

1844年,英国人乔治·威廉(George William)在伦敦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基督教青年会,以“忠事耶稣,敦品立行,更本己立立人之旨,服务同胞,改良社会”为宗旨,向城市中精神苦闷和空虚的青年人传教,并提供一些娱乐活动。在向世界各地拓展的过程中,美国和加拿大联合组成的青年会北美协会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青年会组织。它对中国、日本、印度等国家的青年会有着经济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简称青年会,本文在文中以青年会代指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袁访贵:《余日章传·序》,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 1970年版。

袁访贵:《余日章传》,第 31页。

上和人员上的支持,成为青年会国际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1895年,受北美协会派遣的来会理(David Willard Lyon)牧师在天津的北洋医学堂、北洋大学堂、海军学堂等5所官立学校中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学校青年会。1900年,北美协会在华服务的干事路义思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个城市青年会。民国成立后,基督教青年会迅速发展。1912年,经北京政府批准立案,青年会成为合法的宗教组织,并于同年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会议上,正式将基督教青年会总部的名称确定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至1922年,青年会发展到鼎盛,全国有市会40处,校会200处,会员达7.7万余人。

青年会在中国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以美国为主的北美协会的大力推动。青年会继承了近代流行于美国新教中的“社会福音”思想。在社会福音派看来,单纯关注个人灵魂的得救是不够的,还需改善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环境,传播改造社会的福音,把《圣经》所倡导的“爱”和“公义”的道理贯穿于社会之中,通过为社会提供教育、服务和改革,改善人们生活和工作环境,使社会秩序“基督教化”。面对矛盾丛生、民生凋敝的近代中国社会,青年会秉承“发扬基督教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的宗旨及“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会训,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对国民进行德、智、体、群四育教育,使国民养成完美的人格,并积极参与社会建设,服务社会。

二

近代中国社会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时期,传统社会所遗留的民众素质低下、颓风陋俗等问题,以及因社会转型而出现的新矛盾,成为青年会关注的重点。青年会通过开展提高国民素质的一系列活动,努力构建一种人与人和睦相处、社会安定有序的环境。

青年会提高国民素质的活动主要围绕德、智、体、群四育展开,其中培育良好的道德是青年会四育活动的重点。民国初期是革命运动蓬勃高涨的时期,同时也遇到国民道德水平下降的严重挑战。对提高国民道德水平的急迫性,青年会有比较充分的认识。曾任全国协会总干事的余日章就强调指出:“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道德的退化。若非从提倡道德,改革人心着手,则一切救国的主张皆等于空谈。”青年会将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归结于“国民人心的不良”,从而提出了“人格救国”的口号。青年会将培养基督的人格作为解救的办法,认定“欲挽救人心,必须依赖耶稣基督。奉他为救主,方能得胜一切”,希望从基督教义中吸收爱的力量,以此作为人格修养的根基。青年会力图通过宣传基督教的道德观念,尤其是牺牲个人服务社会的公德观念,对社会道德的改良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有所裨益。

青年会推行的道德改良运动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通过宗教活动,向广大青年传播基督教的道德观念。宗教事工是青年会德育事业的核心。青年会的宗教活动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在各地组织查经班、灵修会、祈祷会、夏令会等。其活动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基督教义,学习圣经,举行宗教演讲和辩论。通过这些活动,青年会向青年宣传基督教的信仰,传播基督教的道德观念,教育青年养成高尚的道德,做事忠实、廉洁、公正、勤俭,有情操、有爱力、有义气、有恒心。

青年会还经常举行或参与各地教会的布道活动,面向社会宣传基督教的道德观念。各地青年会每年春季都组织“新春布道”活动,经常邀请牧师在青年会讲道,并以电影、幻灯吸引市民听讲,劝导人们服膺基督的理念。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二十年,曾有多批“布道家”到中国各城市举行大规模的“布道大会”。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北美协会的干事穆德和布道家艾迪(Sherwood Eddy)。他们每到一城市,都由当地的青年会负责安排布道事宜。1913年,穆德和艾迪到奉天、武汉等14个城

陈秀萍:《浮沉录——中国青年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同济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袁访贲:《余日章传》,第67—68、72页。

市布道,听众多达 13.7 万人。1914 年,艾迪又来到中国,在 12 个城市布道。这些布道家的演说,在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甚至袁世凯、黎元洪等政要也前往听讲,不少青年因此而决志,或加入青年会。

二、利用报刊书籍和演讲等宣传手段,提高青年道德水平。青年会通过全国协会的出版部、书报部出版中文书刊。在 1912 年以前青年会书报部出版的 90 余种书籍中,有关宗教教义、道德修养和立身处世之道的书籍就占 70%。青年会还经常举办道德演说、时事报告和社会问题研讨等活动,引导人们了解国家大事,关心社会问题,逐渐培养人们对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参与意识,唤起人们的社会责任感。

青年会十分重视智育的作用,认为提高民众的智识是改造社会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基本要求。因此,传播科学文化、提高民众的知识水平是青年会改造中国所采取的重要步骤。青年会提倡的教育事业面向广大民众,以社会教育为主。为了推行智育,全国协会和市会、校会都设立了智育部,专门指导各地青年会的教育工作。

演讲是青年会开展比较普遍和经常的活动,其听众从学生到民众,从贫民百姓到达官贵人、社会名流,影响范围极广。演讲的内容包罗万象,既讲解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也介绍近代自然科学常识,还宣讲防治疾病等医学常识。此外,还不失时机地阐明发展教育、提高文化素质的重要性。1906 年前后,天津青年会举行了最早的通俗科学演讲,听众非常踊跃,甚至官立学堂校长也带领学生前来听讲。在青年会的演讲活动中,美国人饶伯森(C·H·Robertson)贡献良多。1902 年,受北美协会的派遣,饶伯森来华。1905 年,他到天津青年会任职,并开始举办科学演讲。1906 年,他调任全国协会从事科普工作,后组织成立了演讲部,领导全国各地青年会推行科学演讲计划。仅 1920 年,饶伯森率领的科学组就在 16 个城市,通过演讲等方式介绍电话、电报、X 光等科学知识,听众达 116000 多人。这些演讲活动不仅传播了先进的科学知识,而且吸引了更多社会人士,并借助他们的地位、财富和权力支持科学教育普及工作。

开展平民教育运动也是青年会智育活动的重要内容。面对“五四”前后知识分子中迅速兴起的平民主义教育思潮,青年会最先将平民教育思想付诸实践。早在一战时期,青年会就在欧洲的参战华工中开展平民教育。在青年会干事晏阳初和傅若愚的推动下,青年会全国协会于 1920 年专门设立了平民教育部。1922 年,青年会书局刊行了晏阳初与傅若愚主编的《平民千字课》,并在长沙、烟台、嘉兴等城市,以大规模的平民识字教育的方式,积极开展平民教育的实验。青年会平教试验的成功引起了国内教育家如陶行知、胡适、朱其慧等人的关注,推动了平教运动在全国的开展。在晏阳初离开青年会单独组织平民教育促进会后,青年会仍继续开展平民教育。京津沪汉等 24 个大中城市的青年会曾举办过大规模的识字运动,全国 200 多个城市和学校青年会都设立了平民学校。据 1935 年统计,全国各地接受过青年会平民教育的学生大约 25 万人。青年会主要在城市中大力推行的平民教育,除了识字之外,还特别注意继续教育,设立了平民高级学校,教授历史、地理、算法、卫生等课程,设立平民图书馆,提供平民读物。除了《平民千字课》外,青年会还编写出版了平民高级课本和讲述平民教育方法的“平教小丛书”,深受社会的欢迎,被很多教育团体当作开展社会教育的教材。平民教育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初兴起,前后持续十几年。青年会是这场教育运动的发起者,也是积极参与者。青年会利用海内外的经济支持和遍及全国的组织网络,为平教工作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这对于开启民智,普及知识,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青年会本着“强国基于强民,强民尤基于强身健康之保存”的理念,把提倡体育视为一项重要的

陈秀萍:《浮沉录——中国青运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第 14 页。

范丽海:“青年会对于文字之贡献”,《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 38 页。

来会理:“中国青年会早期史实之回忆”,《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 197 页。

参见《中华归主》(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790 页。

傅若愚:“青年会对于平民教育之贡献”,《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 48 页。

事功。中国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身体素质的低下,而民众长期以来缺乏对体育的正确认识。“一般人对于体育不甚注意,读书人更有鄙视运动为粗俗不文的。”为实现通过体育提高民众身体素质的目标,青年会自在中国成立之初就注意将近代体育比较系统地介绍进来,并积极促进体育活动的普及发展。来会理到天津建立第一个城市青年会时,就将篮球运动引入中国,而这距篮球运动的发明仅仅4年。在篮球传入中国的过程中,饶伯森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于1904—1908年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任干事期间,经常到北京、天津各校讲解西方体育,积极倡导和宣传近代的篮球运动。1910年,篮球发明人奈史密斯(J. Naismith)博士的学生蔡乐尔(C. Saler)出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时,进一步传授了篮球技术和比赛规则,使中国的篮球运动逐步走上正轨。

青年会积极推动和组织了各种体育运动会,还积极参加国际体育赛事。1909年,时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理事的张伯苓与天津青年会总干事格林(Robert Gailey)、上海青年会体育干事埃克斯纳(M. J. Exner)等人共同努力,于1910年借南洋工业展览会之机在南京成功举办了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运动会。1914年,北京青年会在北平天坛举行了第二次全国运动会。1924年,武昌青年会在武昌举办了第三次全运会,并成立了全国体育协会。在这次运动会上,一些现代体育比赛项目如足球、篮球、网球、棒球、游泳、田径等都已出现。1913年,中国青年会还联合日本青年会和菲律宾体协,成立远东业余运动协会并筹办第一届“远东运动会”。1921年,远东运动会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中国不仅有男运动员出席,而且有1000多名女学生参加。

为提高普通民众的身体素质,方便人们进行体育锻炼,青年会在各地建造体育场、健身房、游泳池等运动场所。在近代中国体育事业极不发达的情况下,青年会所取得的成就特别引人注目,往往成为该地区体育运动的中心。青年会提倡体育,不仅是为了国民的身体素质,锻炼强壮的体质,而且注重体育精神的训练,培养相互协作的意识。曾作过青年会总干事的王正廷就指出:“应知体育一道,不仅为比赛争名,消遣增趣而已,盖所以练习服从规格,养成勇毅精神,强种强国,攸赖实多。”

青年会提倡群育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国民组织社团、参加社会生活的能力。青年会一向强调四育并重,认为在文明的社会中群育是必不可少的。“除德智体三育之外,再适应时代之需要产生一种群育。群育在眼前交通猛进的世界,犹见得重要。”各地青年会专门设立群育部负责开展群育工作。各地青年会通过组织摄影社、演剧社、乒乓球会、文学社等小团体,开展各种各样的文化、体育活动,用潜移默化的方式培养国民的群体意识。而青年会本身也是培养其会员组织意识的场所。“吾人置身期间,可以获得组织之知识,可以增长组织之能率。”这些活动对国民的团体意识和组织能力的提高都有一定的帮助。

基督教青年会在对青年进行德智体群四育教育的同时,还组织青年走向社会,在服务社会的实践中推动青年良好人格的养成。

三

近代中国由于政局动荡,政府无法有效地承担起公共服务的责任。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青年会充分发挥了服务社会、参与解决社会问题等方面的作用。卢作孚曾评论道:“无论其为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乃至社会救济的,凡成为社会问题的,即每每为青年会之问题,每每有青年会发起一种组织,造成一种运动,以促成解决之。”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如恶俗陋习盛行、农村

胡宣明:“我对于青年会的感想”,《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28页。

陈秀萍:《浮沉录——中国青运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第26页。

王正廷:“青年会对于新中国之贡献”,《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31页。

王奔川:“对于青年会五十周年的感想”,《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16页。

卢作孚:“青年会与社会”,《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14页。

经济凋敝、劳资冲突、灾害和战乱频仍等社会问题,青年会都予以关注,组织会员和青年学生力所能及地开展社会服务,进行一些改良实践。归纳起来,青年会主要从事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推行公民教育运动。公民教育就是向民众灌输近代的国家观念,培养公民的爱国心,并使之懂得如何行使公民的权利,履行公民的义务,造就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合格公民,这一举动有助于根除中国人公德观念薄弱的积弊。

1923年,在广州召开的青年会第九次全国大会上,正式决议开展公民教育运动。青年会以刘湛恩为全国协会公民教育干事,主持其事。刘湛恩先后编写了许多公民教育的材料,其中包括公民研究会办法、公民训练班办法,以及其他公民学习、研究资料,如地方自治、国际问题、不平等条约、国内问题、三民主义、公民诗歌等。1924年,青年会在广州和北京两地试办公民教育,组织了公民研究社。第二年,将公民教育运动推向全国,共组织公民研究社 97 个。针对民众文化水平偏低的现状,青年会采取了幻灯演讲、千字课等宣传方式,以期取得良好的效果。此外,青年会还根据城市和乡村的不同情况分别开展了市政和乡村公民教育运动。通过开展公民教育运动,“公民程度日渐增高,公民对于中华民国的认识,对于政府应尽之义务,与公民应有之权利等等,较前明瞭。”

二、开展农村服务。在 20 世纪初中国农村出现严重危机的情况下,青年会对农村给予特别关注,将农民问题视为关系国家、社会的重要问题。青年会认为农村的凋敝“一方面固然为了天灾人祸的相逼,外国经济实力的侵入;一方面也是由于农民本身智识的低落,凡事不知求进改良,以致无力抗拒世界经济潮流的摧残。”为此,青年会在全国一些地区创办农村服务试点。1928年,全国协会与苏州青年会合作,在苏州的唯亭山创办了青年会第一个农村服务实验场。在此,青年会改良农业生产方法,组织各种合作社,提高农民生产能力,并举行通俗演讲,开展识字教育,提倡公共卫生,培养农民的爱国爱乡精神。唯亭山农村服务实验获得成功后,芜湖、香港、广州、重庆、济南、杭州等十几个城市的青年会都提供了不同的农村服务,并取得一定的成效。

三、提倡劳工新村运动。青年会认为工人生活的极端贫困和日益紧张的劳资关系,对家庭生活、社会秩序以及工业生产等方面都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大力提倡劳资合作。193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青年会在会刊《青年进步》上推出“劳工专号”。该刊主编范丽海在卷首语中特别强调:“吾国的五一节应当是劳资合作的五一节,而不是阶级战争的五一节。”青年会认为解决劳工问题,“唯一实际而根本之计,即为实施劳工新村制度。”1926年,上海青年会为改善工人的住房条件,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在浦东工人聚居区建立了“浦东新村”。青年会自筹资金,修建了几十所房舍供工人居住,并帮助村民实行自治。青年会在村中举办平民教育,提倡公共卫生和文明的消遣娱乐方式。经过几年的努力,新村中工人的素质和村中的社会风气得到改善,赌博等活动基本根除,村民对公共事务的热情也日渐高涨。

四、提倡公共卫生,开展卫生服务。近代中国经济与科学文化的落后,造成民众卫生健康水平的低下。“中国对于卫生知识素乏讲求,个人卫生既多忽视,公共卫生更无设施,一遇时疫瞠视莫救。”青年会全国协会演讲部专门设立了卫生组,负责推进各地的卫生宣传工作。1915年前后,上海、长沙、南京等市的青年会举办了大规模的公众健康展览,得到当地官员、士绅的赞助和支持,在市民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青年会还组织青年学生走上街头,进行各种卫生宣传,如向市民发放卫生日历等宣传品,发送苍蝇拍,开展灭蝇活动,组织种痘和身体检查,打扫街道等。这些活动,对市

参见袁访贵:《徐日章传》,第 54 页。

董修甲:“青年会对于公民教育之贡献”,《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 44—45 页。

张颢:“青年会对于农村之贡献”,《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 65 页。

参见陈秀萍:《浮沉录——中国青运与基督教男女青年会》,第 36—37、35 页。

《青年进步》,1930 年 5 月,第 133 册,第 4 页。

朱懋澄:“青年会与劳工新村运动”,《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 62 页。

王正廷:“青年会对于新中国之贡献”,《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 29—30 页。

民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有一定的帮助。

五、积极开展赈灾、战时救护等慈善活动。青年会秉承基督教的“博爱”、“救世”的精神,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救助苦难的民众,其中既有日常救助,也有紧急救济。而青年会所实施的救助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医疗、教育、生计等诸多方面。因此,青年会“一到了非常时期,或遇紧急事变发生时,它便会利用它的组织及人才,对事变作临时的适应,或者举办特殊的事工,为社会国家作相当之效劳。”例如1917年华北大水灾期间,北京与天津的基督教青年会参加了以熊希龄为会长的“京畿水灾筹赈联合会”,为灾民设立了几百处粥厂和留养处,并采取以工代赈的方法,组织灾民修筑京畿道路,使灾民得到救济。总统冯国璋为表彰天津青年会的功绩,还题赠匾额曰“己溺己饥”。

在战争期间,青年会积极开展伤兵救护和难民救济等工作。抗日战争时期,青年会全国协会组织了军人服务部,组织各地青年会为抗日军人提供医护、娱乐、教育及生活照顾等各种服务。抗日战争中,蒋介石曾盛赞青年会:“各地青年会本着服务的旨趣,发动民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在各战区普遍地设立军人服务站,不辞劳苦,出入于枪林弹雨中,为抗战将士供应茶水,为负伤袍泽协助输送,其他如担架,慰劳,救济,都本着基督博爱的精神,尽国民应有的天职,这是举国所称颂的,也是我所深知的事实。”

四

在融入近代中国社会的过程中,青年会采取了有效的发展策略,即走上层路线,影响中国的精英人物,使其参与青年会的事业。而精英人物接近青年会,则主要是因为它所宣传的人格救国、社会服务等理念,适应了近代以来中国维新变革和救亡图存的发展趋势,给处于迷茫和困惑中的中国人带来了某种希望。而青年会健全的组织网络和民主化的运作方式,为精英人物实践其服务社会、拯救民族危机的理想提供了条件和平台。

青年会通过提出切合近代中国社会实际的思想理念和服务社会的实践活动,逐步得到精英人物的认可和尊敬。王正廷在给穆德的一封信中就坦言:现在我们很容易为青年会集资,因为各部的领导都是我的朋友和同学,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向他们求助。考察青年会的成员,就会发现其中有众多政治界、教育界人士。如曾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南开学校创始人张伯苓、清华校长梅贻琦等都是青年会的成员。各地青年会的干事也多为经济界的精英人物,如天津青年会的雍剑秋、宋卿、宋则久等人。地方名流、社会贤达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和良好形象,不仅为青年会的发展提供了便利,而且有助于青年会在社会上塑造正面的形象。

青年会在吸引精英人物参与改造社会的活动中,通过发挥各自优势,相互支持与帮助,实现了良性互动,达到共赢。一方面,青年会为精英人物服务社会提供了物质帮助和精神支持。例如,在南开学校建立的过程中,天津青年会为南开学校提供了可靠的教学保证和高质量的师资力量。格林、饶伯森、郝瑞满、蔡乐尔、陶尔图、赖阳、韩慕儒、洛得伟等人在南开学校兼课,讲授英文、体育和理科等课程,还在课余指导学生开展文艺、体育活动;关锡斌等干事曾来校讲演。在青年会的帮助和指导下,南开学校的体育活动,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这对南开创建之初增强实力和扩大社会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透过南开学校创始人张伯苓与青年会的交往可以发现,青年会成员那种奋发不息、顽强进取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一度为厌世情绪所困扰的张伯苓,由钦佩而折服。这也成

应远涛:“青年会对于赈灾之贡献”,《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69页。

参见周秋光:《熊希龄传》,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0—521页。

American YMCA National Archives, International Division, China, Print, We Fight For China—Six Years of War Service (1937—1943), p. 1. 转引自左芙蓉:《社会福音·社会服务与社会改造》,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283页。

参见 Shirley G. Garret, *Social Reformers in Urban China—The Chinese YMCA (1895—1926)*,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07, p. 119.

为张伯苓逐渐认同和接近基督教的一大要素。在创办南开学校遭遇困难和阻力时,张伯苓亦从耶稣身上获得启示和力量,不断地奋力前行。

另一方面,精英人物除了加入青年会,参与青年会的活动之外,还为青年会提供经费和人才等方面的支持。例如张伯苓主持的南开大学积极参加天津青年会的活动,何廉、方显廷、张彭春、黄钰生等教授都曾在青年会做过学术讲演。张伯苓还为天津青年会培养、推荐了许多干部,南开学校的毕业生如梅贻琦、杨肖彭和教师王治平都曾在天津青年会担任干事或总干事。章辑五、仇乃如等教师都曾参加过青年会的体育、智育事业部,并任委员。

为更好地融入中国社会,青年会非常重视与社会各界建立起和谐的关系。由于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赞许和认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为尽快实现本色化,青年会努力争取在资金、领袖人选等方面获得一定的自主性。从1907年至1933年,全国青年会共有6任董事长,除了第一任董事长潘慎文为外国人外,其余5人均为中国。在开展社会服务时,青年会注重与其他社会团体的合作。在平民教育和赈灾等活动中,青年会与其他团体均能密切合作。1934年,在第十二届青年会大会上,范诩诩作了题为“合作建国”的演讲,不仅强调青年会内部的合作,而且强调与政府、社会、学术界、劳工、农村的合作,并以“勤”、“诚”、“公”三字作为合作的原则。经过长期的努力,青年会的多项事工得到社会的理解和认可。青年会“成绩已有如是之佳,今则时代演进,各方对青年会已有深切认识,无论政府人民,无不视青年会为国家之命脉,社会之灵魂,扶之植之,唯恐其坠。”

在融入近代中国社会的过程中,青年会通过社会服务,表达出对现实世界的关怀,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某些中国人仇视基督教的心理。“犹幸青年会之人员,多系德望隆重,奔走呼号之下,一般青年多受改善。……自此社会心理为之一变,隔阂尽除。各界人士至此对于基督教之事工已甚谅解欢迎”。这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五 简短结语

自1895年青年会传入中国以来,近代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动荡与社会变动。如何消弭社会不和谐的因素,建构和谐的社会机制,成为一些社会团体和组织努力的目标之一。为实践社会福音思想,青年会以服务社会为职志,提倡“人格救国”。这在一定程度上迎接了社会现实的挑战,也取得一定的效果。而青年会寄希望于通过传扬基督教博爱思想来感化青年,培养基督人格,解决社会问题的构想,不仅受到了近代革命民族主义者的抨击,还遇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很多阻力。青年会所希望建立的“基督教化的社会秩序,也因与中国社会的传统文化和近代中国社会现实的冲突而难以彻底实现。尽管如此,青年会为在中国传播西方近代文明,培养青年高尚人格,解决近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实现社会和谐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还是值得重新审视和客观肯定的。

综上所述,在服务社会和消弥基督教与中华文化冲突,进而实现近代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历史进程中,青年会做出了切实努力和一定的贡献。

(责任编辑:冯志阳)

参见侯杰、秦方:《百年家族·张伯苓》,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7、59页。

参见骆维廉:“全国协会历任董事长生平之回忆”,《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162—169页。

王奔川:“对于青年会五十周年的感想”,《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16—17页。

朱立德:“对于青年会之检讨与展望”,《青年会五十周年纪念册》,第21页。

Abstract

On Mao Zedong 's Anxiety over Life in His Old Age

XIAO Yan zhong, ZENG Zimo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o Zedong 's awareness of death and the series of political movem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psychology. It holds that Mao is a talent who could converse with death and in the meantime challenge the anxiety of death. It is this kind of survival complex that generated in him a pursuit of spiritual eternity, and he attempted to dispel this anxiety by frequently initiating political movements in his old age.

The Formation of the Views towards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Focusing on the Period from the Late 1870s to the Early 1890s

[Japan] TeY oK Ū u Ji Trans L I Peng yu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views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towards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after the 1870s. The change of ways of addressing showed that Chinese began to accept the western civilization from then on, no longer regarding China as the sole center of world civilization. During this process, foreigners who came to China introduced western civilization together with critical ideas towards Chinese culture through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which served to shape the formation of new concept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From Collection House to Library: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Library System in China

ZUO Yu he

China has had the tradition of collecting books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has formed a complete collection system. The collection house nurtured many elite scholars and included buds of modern library system. Modern libraries and academic researches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each other. Therefore the libraries become the place where important materials are housed and read, where the academic information is collected and delivered. It has actually become the important place of academic gatherings besides new institutes, universities and professional academies.

Christianity and the Social Harmony of Modern China——With Chinese YMCA as A Case

HOU Jie, WANG Wen bin

The Chinese YMCA is an active non -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 modern China. To realize its social aim and solve the problems of low quality of the Chinese, YMCA has carried out many social service activities to rebuild the society. As a social group with Christian background, YMCA aims to influence the top - graders. It has made positive efforts in solving the Chinese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removed the conflicts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 and contributes to the harmony of Chinese society.

On the Features of the Nationalism Thought of Sun Yet - San

CUI Zhi hai

Nationalism thought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hree People 's Principles put forward by Sun Yet - San, it was first promoted with the largest influence among the three thoughts. It displayed three distinctive features in its development: first, to admit equality and defend the unity of all nationalities; second, to make the unification of the nation as the key concept of nationalism; third, to make " alleviating the weak nations and supporting those in crisis " a principle in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nations.

The Restrictions upon Foreign Lawyer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 Focusing on Foreign Lawyers in Shanghai

CHEN Tong

Based on abundant historical facts,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foreign lawyers, had gone through a